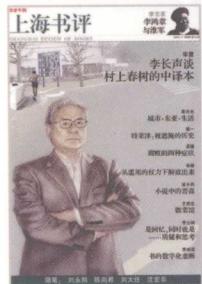


让记忆校正记忆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让记忆校正记忆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记忆校正记忆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0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8)

ISBN 978-7-5458-0144-6

I. 让… II. 东…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9928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特约编辑 华 慧

技术编辑 吴 放

让记忆校正记忆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0144-6 /1 · 52

定 价 20.00元

让记忆校正记忆

《上海书评》第8辑

CONTENTS

■ 谈访 & 口述

- | | | |
|-----|---------------|-----|
| 003 | 李长声谈村上作品的中文翻译 | 华 慧 |
| 009 | 高田时雄谈敦煌学 | 黄晓峰 |
| 015 | 李敖谈李敖 | 曹可凡 |
| 022 | 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 | 盛 韵 |

■ 特稿 & 书评

- | | | |
|-----|-------------|----------------------|
| 031 | 城市·东亚·生活 | 葛兆光 / 口述
盛 韵 / 记录 |
| 038 | 特莱津：被遮掩的历史 | 维 一 |
| 047 | 腐败的四种症状 | 梁 捷 |
| 053 | 从滥用的权力下解放出来 | 张 媛 |
| 059 | 淮军：从偏师到劲旅 | 李志茗 |
| 065 | 小说中的晋商 | 梁小民 |
| 071 | 徽菜馆 | 王振忠 |
| 076 | 顾颉刚铭“九鼎” | 朱维铮 |

CONTENTS

084	知识分子应当尊敬谁?	赵毅衡
088	让记忆校正记忆	王晓渔
093	不是“学院式的作品”,有意思吗?	陈引驰
100	恩典与经文	苏友贞
105	英国人是人么?	刘 铮
110	死于摇滚	李 黎
116	一张兴隆票:一个小家庭的破产故事	俞 江
121	“李约瑟问题”	余英时
133	单说《十字莲花》的“硬伤”	高山杉
139	无端因缘著文章	高 林
145	失意成就大总统	王则柯
152	如果开始就知道结局	袁筱一
157	莎士比亚真不难读吗? ——兼答网友	陆谷孙
163	极繁的小说,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	比目鱼
169	贫民窟的印度神灯	李 黎
175	为大屠杀开脱?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179	诗可以观 ——读内藤湖南的汉诗	李学松

CONTENTS

190	圣经正典的形成	高峰枫
195	真假丈夫和历史真相	小 白
201	指尖薄技,还是工倕之巧? ——漫论手机语言“现象”	陆谷孙
208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王学泰

■ 笔记 & 随笔

215	是回忆,同时也是……质疑和思考	李公明
217	书的数字化垄断	乔纳森
220	钱锺书两则妙语的西方来历	刘永翔
223	到底是上海的雪	沈宏非
225	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	陈尚君
227	二流小说家的自白	刘大任
230	人曾经如何……认识和对待自然?	李公明
232	城市让人心焦	小 宝
234	死亡的文明与孤独	梁文道
236	“山寨美学”及其文化策略	沈宏非
239	《回乡》遗漏的一次回乡	杨逢彬

CONTENTS

240	小市民的《梅兰芳》	郑培凯
242	为面包卖唱	刘绍铭
244	随后……坏天气就来了	李公明
246	克娄巴特拉有真相吗?	乔纳森
249	村上春树的墙与蛋	毛丹青
251	狗屁问题	沈宏非
253	赵瑞蕻先生与南园诗社	徐有富
256	倚天屠牛记	刘绍铭
258	帕托契克的……责任观与捷克现象学	李公明
260	谈情说爱的科学观	小 宝
262	一纸清供	董 桥
265	未曾开卷已先颓	沈宏非
267	永井荷风的东京	李长声
271	撩事斗非	刘绍铭
273	后记	

访谈 & 口述

李长声谈村上作品的中文翻译

华 慧

上个月,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中译本面世,译者不再是之前翻译了二十多本村上作品的林少华,于是引出了一场关于哪个译本更好的争论。记者日前采访了专攻日本出版文化的旅日学者李长声先生,请他就村上作品中文本的翻译谈了一些看法。

您看过村上春树这本新著吗?觉得怎么样?

李长声:“谈跑时我谈的”,这是原题直译,其实一般日本人通常不会这么说,这就是村上春树的风格。似乎译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也有点啰嗦。译作“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好像就有点走样了。内容谈的是跑与写,算不上自传。村上是一贯写自己的作家,随笔就更不用说了。日本人写随笔,几乎就是写自己,这是日本传统。小说也有所谓“私小说”,就是写自己的私生活。有一阵子村上很爱在网上交谈,可惜没有像跑步那样坚持下来。这本随笔的书名是拿来的,村上的一大特点是惯会拿来现成的东西作书名。这本来是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书名,“谈爱时我们谈的”,他的日译本就是村上翻译的。我觉得,除了有关跑的想法,关于他的写作历程,没有多少新东西,在他以前的随笔及小说的前言后记里都读到过。从翻译来说,村上用的这个“跑”字

就值得注意，通常日本人是使用外来语“跑步”，纯粹体育性运动，他却用了个地道的日语动词，别有意境，很值得玩味。

村上春树每天长跑，无非是锻炼身体，没什么稀奇的。他这个人生活非常有规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觉得，他是文学家，但算不上思想家，只有些小奸小猾。从思想来说，不能把他跟王小波比较，而文学上或许跟张爱玲比比更有趣。事实上，在日本拿他不以为然的批评家不少，但好像没人告诉中国人。这也是翻译领域的问题。

您曾经在《日边瞻日本》一书中谈到：“村上春树的文字较为平白，每每直译过来就是了，略施文采就可能走样。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很难译，日本人说读不懂……”您能更详细地说说吗？

李长声：对于日本人来说，村上的文字是浅白平易的，吸引他们的特别是那种翻译腔。当年被列选芥川奖，大江健三郎等评委就批评他外国的翻译小说读得太多了，有股子黄油味儿。村上的文体不是花里胡哨的，不是文绉绉的。他擅长比喻，很现代、很未来式的比喻。水太清澈，清澈见底，就可能估量不准它的深度。有时候弄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弄不清深层的意思，但是说穿了，也可能底下本没有意思。这就叫穿凿，凿穿了是空的，空空如也，反倒更叫人想入非非。我们把他读得很小资，其实是误读了时代，这可能是中国与日本的时代之差。

您怎么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

李长声：日本至今也有林琴南那种翻译，叫“超译”，是用来翻译欧美的推理小说。或许推理小说可以这么干，因为忙着看情节，忙着破案，作者和读者顾不上文学，“超译”也无妨，但村上春树的小说是文学，中国人也需要读出文学来。

那么，这文学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呢？从作家来说是日本的，从译者来说是中国的。不过，如林语堂比喻的，说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袜子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或者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我认为，原作是女人，美取决于女人的大腿，丝袜固然增加美，但丝袜越透明越好。

一个译者有一个译者的风格，但作家的风格不可以被译者的风格遮

没。译者的本事在于隐藏自己，这份苦心就是翻译的文学创造。总想逞自己的个性，比如表达一个意思非琢磨用一个成语不可，结果中国读者得到的印象就可能跟原作读者的印象不一样，就改变了原作的风格。

有人批评林少华先生的译文跟村上的原文风格并不相符，去年藤井省三教授也曾在其专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中质疑林的翻译，认为林译对村上的原文作了太多的“粉饰”。您怎么看？

李长声：村上的文字读来是比较平白的，但平白可不是直译就行了，而要用中文的技艺（技术与艺术）表现出平白，中国读者觉得平白才算译出了平白。更难的是，村上的平白是假面，他的叙述腔调是平白的，但阴阳怪气，总像是话里有话，这就不好译了。至于说林译到底符不符合村上的风格，事情也好办，不懂日语的人不妨把他译的村上作品跟他译的其他作品比较一下，如果都一个味儿，那就说明只有他的“林风”。怕只怕少有这样的好事者。

我认识藤井省三教授，当然不敢说是我的朋友，但说是酒友，他也同意的。他送给我那本研究村上春树在亚洲的书，以及台湾译本，我翻阅过。藤井对林少华的品评有偏颇，未免太偏向台湾。我了解林少华，当年他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生，我当《日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他的第一篇译作《天皇的帽子》就是我约他译的。他的长处是中日文都好，相得益彰，这么有两把刷子的译者很罕见。但他也有一个“痼癖”，就是弄词藻。肚子里词藻满满的，顺着笔管往外流。当年我和南京译林的编辑就议论他这一点。说得狠一点，在这一点上他多少把村上庸俗化了。可有趣的是，中国小资读者们接受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吧。村上笔下的人物进屋就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喝，听美国流行音乐，不知我们的小资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吉野家、肯德基，招牌还是人家的招牌，但味道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了，而且比本家高档化，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功过是非，真难说。

林先生最近在反驳被指译文不够“准确”时，引用别人的话中有一句“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长声：这个“别人的话”说得不大对。我敢说，村上的小说谁译都畅销。所以才有人说，村上是一个社会现象，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都是这样，所以藤井省三才能写一本书。好像林少华也译过一本在日本史无前例的畅销的小说，叫什么《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似乎在中国就不大有销路。林少华还是林少华，但作家换人了。

译者有自己的文体，自己的风格，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译者是译者，不是原作者。不仅语言不一样了，人也不一样了。所谓翻译文学，这文学二字也包含了译者的文学创造。一看就知道是傅雷译的，一看就知道是林少华译的，保持自己的风格没什么不对。译者给原作穿上丝袜，是非穿不可的，但不要喧宾夺主，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写你自己的东西。

译笔上无视原作，我行我素，这是翻译的霸道。甚而很可能译者本来就看不懂原作的风格，乃至压根儿不懂什么叫风格。若认为全凭了他的译笔，人家的作品才得以风行，那就更阿Q了。村上说过，要是能译得比原作好，那你就自己写好了。你写呀？有的译者也写散文、小说，一看那散文、小说就露了怯，境界、教养、见识等，跟人家有天壤之别。

网络上一直也有很多读者在讨论村上中译本的翻译。

李长声：贵报有一篇文章叫《有认真的译者，才有认真的读者》，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那就是“有认真的读者，才有认真的译者”。而且，有认真的读者，才能有认真的编辑，可能这一点更重要，因为编辑是把关的。现在不少是编辑跟译者合伙，沆瀣一气蒙读者。读者不认真，只读故事，不读文学，所以译者也就搞快餐，什么人都敢下厨掌勺。例如，村上龙的小说是“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还是“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好像没有读者去问过。

现在的译者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所谓畅销书，抓过来一本书就译，对作者及其书里书外毫无了解，简直像临场口译一样。而且，自己翻译了，就把那本书往好里说。这样，不仅译得可能好不了，也可能误导读者对作者的认识。也不要迷信在国外的人，有的人是在推销他自己的货色，有的人是在讨好他的导师，而且有好些在国外生活的人其实是文盲，会说话不等于会读书，更不等于能读出书的好坏。

不过，版权是一个问题，它维护了作者以及译者的权益，却阻碍了翻

译水准的提升。翻译需要有比较,有鉴别,但只许这一个人翻译,只许这一家出版,别无分店,就只好看着胡译乱译臭了街。所幸台湾和大陆有繁简字之别,同样是中文,人家可以卖两份版权,而出现两个译本,就有了比较、鉴别的机会,反倒是好事。

台湾赖明珠的译本和这次新出的施小炜的译本您都读过吗?

李长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编辑《日本文学》杂志,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了村上春树,可能这是他的作品最初出现在大陆。当时随便拿来了台湾赖明珠翻译的几个短篇。去年在东京见到赖明珠,我还表示了歉意,不过,算不上盗版,因为那时候中国没加入国际版权组织。

1988年,我随大流自费去了日本,记得还写过《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书评,以后再也没读过村上作品的中译本。施小炜的译本没读过,也不想读,因为我不是搞翻译批评的,没必要特意读译本。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施、林两位先生对对方的译文互有指责,施称林译有许多硬伤,“可谓俯拾皆是”,说他的翻译“是一种凭空想象的风格”。而林说施“对村上的文体把握得不好”,“他的汉语不太考究”。对此您怎么看?

李长声:译者最需要的品格是谦虚。翻译不可能没错,但不能拿这话当挡箭牌。被人家抓住了,没必要辩解,甚至强辩,更不要反唇相讥,把下一本译得更好就是了。批评翻译,最需要的是与人为善,旨在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不是借此卖弄自己。不要用“俯拾皆是”之类的字眼儿,太夸张会惹人反感。所谓翻译水平,其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水平。翻译批评也是为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起码要知道翻译有好坏,鄙视、抛弃那种把你当猴耍的翻译。

我也偶然做翻译,倘若批评别人的翻译,并不是说我就比人家高明,只是偏巧看出了问题罢了。一批评,可能有人就反过来挑我的问题,这倒是好事。不用交学费就给你批改作业,有什么不好?小肚鸡肠的人,最好不要搞翻译,你会受不了批评的。

施小炜说发现林译有很多硬伤,我觉得他可以撰文发表,借此兴起或推进我国的翻译批评,功莫大焉。三十多年前,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几位

教师曾试图展开翻译批评，我至今敬佩他们，可惜被三两个编辑打压了下去。

有一个日本人，把村上作品的英译本逐一跟原作对照，发现英译本译得丢三落四，令人担心，靠那种译本在欧美得奖，那还是村上吗？现在译者之间互相攻击，说什么风格啦文体啦，好像拿冻豆包当石头扔，闹不清他们真知道手里拿的是豆包，还是只不过把这些概念当石头扔。译者有时候会看走眼，当然该指摘，但更为可怕的翻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这就需要翻译批评来揭穿鬼把戏。

都说周作人译得好，简直是一个共识，但其实，这不是由批评得出的结论。真好假好？好在哪儿？需要翻译批评。与欧美文学相比，翻译日本文学之难，最难在中文上，日文的汉字，以及日本的历史及生活，都难以转换成纯粹的中文。例如“男人的大和”，看似没问题，其实译作“男子汉的大和”才出彩。“写真”译不译作照片？应该译，因为所谓写真好像是来自日本，但我们的年轻人觉得用它是非常洋气的，而日本人平常说“写真”，就是普普通通的照片。

村上作品里的所谓西洋元素，在日本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东西，村上听的爵士乐，日本的爵士乐爱好者都熟悉，村上的人物点的食物，同时代的日本人都知道。恰恰在这些元素上，村上与读者有默契，是符号，他一提，读者便会心一笑，这也正是他得以畅销的元素之一。只懂日语不懂日本是译不好的。

您怎么看待引起这次风波的出版方的做法？

李长声：听说《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是南海出版公司用高价竞争来的，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而且借此打破了一家出版社垄断、一个译者垄断，在这一点上别有意义。我不了解情况，不明白少华兄为什么作弃妇状，但他能垄断村上，靠的是出版垄断，而为了文学翻译，这种垄断并非好现象。如果能同时出版两个译本，那就更有意思，是出版社做好事，为批评提供文本。 ■

（2009年2月15日）

高田时雄谈敦煌学

黄晓峰

高田时雄，1980年获得法国哲学博士，2005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日本著名东方学家、敦煌学家，并担任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对于海外以及中国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有深刻的洞见。

请您谈谈中国敦煌学目前的进展情况。

高田时雄：我个人的看法是，早期的敦煌学中，中国学者起的作用虽然很重要，不过还不能说是敦煌学的主干力量。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敦煌学发展得非常快。现在敦煌学者中，中国学者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差不多有70%到80%以上都是中国学者。我们搞国际敦煌学联络委员会，举办国际研讨会，参会学者一大半都是中国学者。所以说，敦煌学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的学问，而以前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除了人数众多以外，中国学者研究的专业也非常广泛。以前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从事胡语研究的，像古代回鹘语、古代藏语、和田文、粟特文、古叙利亚文等。最近这十年来，中国的年轻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留学国外归来，加强了胡语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过我想，对于胡语研究方面，目前中国学者的贡献还很有限。在胡语研究方面，国外的学者水平

还是要高一些。当然，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学者可能会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

另外一个特点是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1949年后的中国，很少人对佛教文献进行研究，近二十年来有所改变。有一些很优秀的佛教学家，不仅对佛教文献，而且对佛教思想、佛教目录学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现在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从事佛教文献残片整理的大都是中国学者，比如方广锠先生。而以前在英国、法国从事敦煌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日本的佛教研究有很长的传统，不仅是汉文《大藏经》的研究，还研究其他语种的佛教文献。日本的佛教研究门类非常大，中国在敦煌佛教文献方面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这个我很坦白地说。不过，日本的佛教界现在很重视中国中青年学者的成果。日本在手抄本佛教文献陆续有新发现，在跟敦煌佛教文献的比较对勘研究方面有不少进展。这方面，中国的佛教学家也很感兴趣，一起进行合作研究。

一个是胡语，一个是佛教文献，这两个方面，以前是中国敦煌学研究门类中所不足的，现在有了长足的进步。

原来我们比较重视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

高田时雄：早期的敦煌学，学者很注意文献中发现的中原地区没有的古逸书，所以很多人在用辑佚的方式进行研究。二战以后，日本的学者藤枝晃先生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不对，需要把敦煌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现在的敦煌学研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在走这样一条整体的路。敦煌文献还是敦煌当地的地域文献。现在甘肃那边研究比较深的是将敦煌遗书作为地方文献的研究。当然，敦煌文献是表现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个重要材料，不过主要是敦煌地区的，并不是中原的，这是有差别的。现在中国国内的敦煌学还在用隋代的、唐代的、五代的、宋代的来这么分，这样并不能表现出当时敦煌的政治情况。至少九世纪以后的敦煌并不是由长安的中央政权控制的。

所以，敦煌文献应该作为当时敦煌国的文书来研究。在唐代前期，敦煌当然属于长安的中央政权。不过，到八世纪时，吐蕃进入敦煌，敦煌在吐蕃的控制下，脱离了唐帝国的统治。